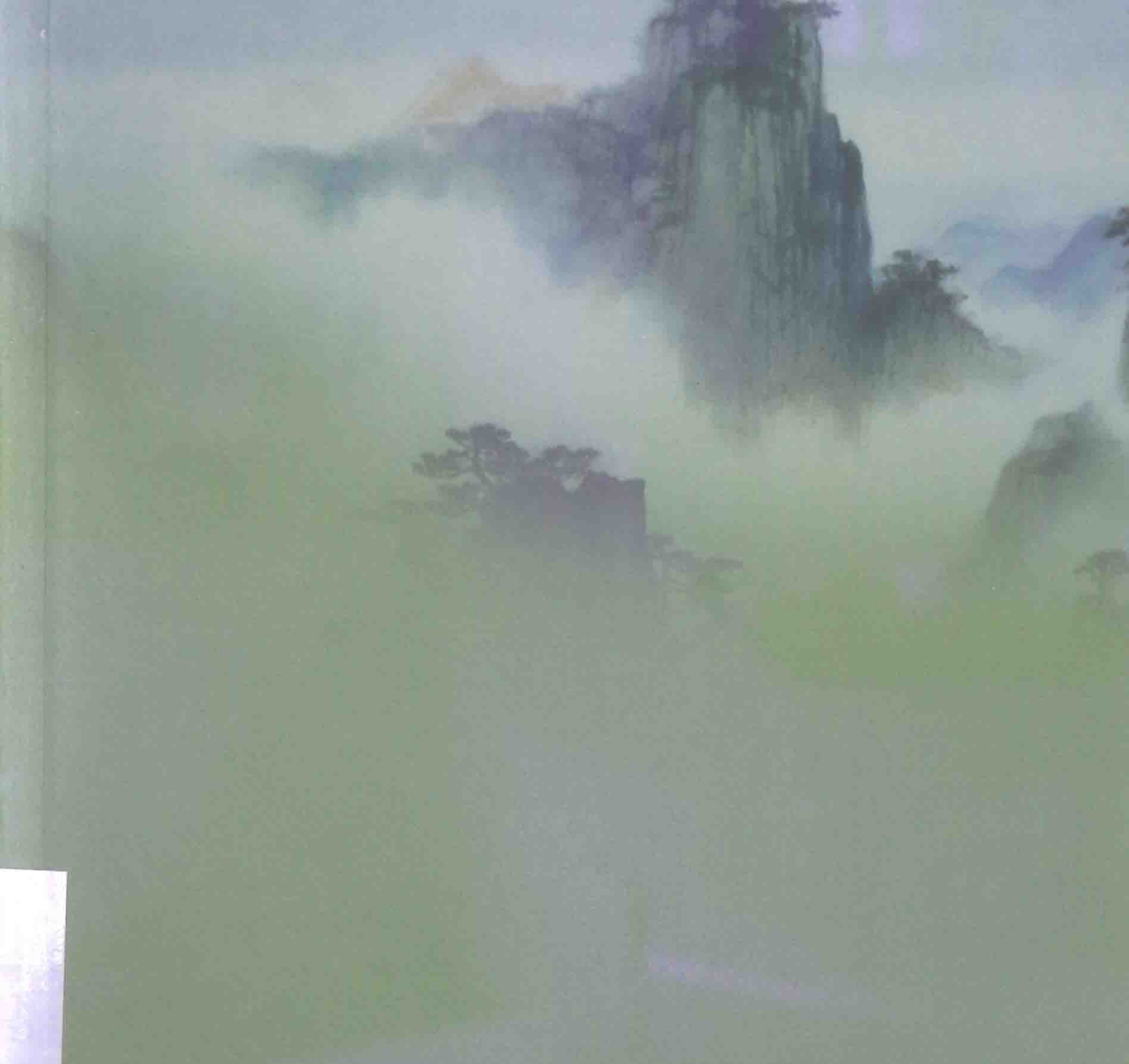




多维视野下的文学经验与文化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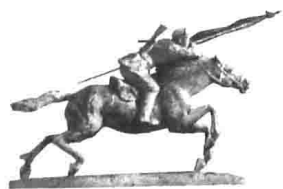
刘畅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多维视野下的文学经验 与文化反思

刘 畅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视野下的文学经验与文化反思 / 刘畅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4.9

ISBN 978 - 7 - 5033 - 2525 - 0

I. ①多…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0079 号

书 名: 多维视野下的文学经验与文化反思

作 者: 刘 畅

责任编辑: 张 鹰

封面设计: 汪梦狄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 - mail: jfwyb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14 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525 - 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文学的凝眸与剖析(序)

杨剑龙

文学创作是对于生活的形象写照,文学批评是对于文学作品的凝眸与剖析;文学创作是作家与生活的对话,文学批评是批评家与作家的晤谈。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孤独的事业,那么文学批评更是一种寂寞的耕耘,这种孤独与寂寞都需要对文学的挚爱来支撑,尤其在这个日趋市场化商业化的时代。

刘畅有一颗文学的爱心,或许是家庭的熏陶,或许是环境的濡染,或许是学校的教育,让他将兴趣与事业定位在文学研究,这便有了他人生的这第一本学术著作,展现出他对于文学的凝眸,呈现出他对于文学的剖析。

文学批评必须有一种文学史视野,将对于一部作品的批评置于作家创作的轨迹中评析,将对于一种文学现象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视阈中观照,才能真正见出其长短与真谛,这就需要批评家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呈现在我面前的著作就具有这种学术视野。刘畅将该著分为现代与当代两辑,在中国现代文学视阈中,他研究普罗文学、新月派诗歌理论、鲁迅的小说观、张资平的基督教观、基督教新文化运动、20—30年代上海电影等;在中国当代文学视阈中,他凝眸新时期小说中“新乡绅”形象、90年代以来的都市叙事及其电影改编、新生代散文的话语转换、李晓君的散文、江子的散文、范晓波的散文、夏磊的散

文、长篇小说《双龙村纪事》、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传记文学《晚清悲风——文廷式传》等,在比较开阔的文学史视野中,选择研究对象、深入分析评说,分析作家的创作风格,探究作品的价值意义,评说文学创作的长与短。

文学批评必须有鲜明的学术意识,体现在文学研究选题与构想中的问题意识,并非对于研究对象的简单介绍梳理,而是在研究中发现問題、分析问题,呈现出深入肯綮的学术思维,呈现在我面前的著作就具有这种学术意识。刘畅重新审视晚清政治小说与普罗小说的同质化特征,意图从这一层面理解 20 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的历史趋向。刘畅指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刘畅从“新乡绅”形象角度研究新时期文学,认为“新乡绅”形象直观地呈现了乡土文化的情性和当代农村政治文化的缺失,体现出作家对农村体制改革的焦虑。刘畅分析“新散文”命名的尴尬,认为折射出新散文理论建构和发展前景的晦涩不明。刘畅指出新生代散文创造出更加贴近自我的话语方式,在语体的层面对传统散文进行革命性的颠覆。这些论题的选择与分析,都呈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

文学批评必须注重清醒的方法意识,针对研究论题、研究对象等特点,选择和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切入研究对象本身,从而有新颖独到的发现,呈现在我面前的著作就具有这种追求。刘畅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三笑”故事的电影改编,探讨经典文本的电影改编、翻拍及其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刘畅以上世纪 20 年代上海的大众文化语境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影戏”观的形成和电影人的戏剧经验来重新审视“戏人”的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刘畅以美学研究的方法分析 30 年代的普罗文学,认为普罗文学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审美化。刘畅认为新月派恢复了以含蓄蕴藉为美的古典美学原则,是对传统诗歌理论的继承和现代语境下的创新。刘畅以印象分析的方法评说散文创作,李晓君“一个苦吟的诗人,用忧郁的目光搜寻着灵魂的栖息地”;“江子散文更为突出的特点是从一个个残缺的生命中体味生存的沉重”;范晓波的散文“要在这个迷茫惶惑的时代寻找成长的足迹,寻找生活的路途中失落的意义”。在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刘畅常常有其独到的发现与评说。

刘畅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在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得硕士学位,2008年跟随我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他以上海20—30年代的电影研究为学位论文,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在已是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籍刘畅的文学研究中,有不少是以江西的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呈现出其对于故土的关心与热情。

刘畅是一位沉静的青年学者,具有敏捷的思维和开阔的思路,善于发现问题、捕捉论题,能够将论题作条分缕析的探究,虽然在该著中,也见出某些研究的欠深入与欠深刻,但仍呈现出一位青年学者的扎实功底和厚实潜力。

人云“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的刘畅比我们这代学者幸运得多,我们因时代的动荡而轻掷了诸多岁月,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壬辰年刘畅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爱情的果实,甲午年他即将出版这部著作,作为导师的我,看到他的成就,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祝愿刘畅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有更大的成就与建树。

2014年3月27日

于谿语斋

目 录

文学的凝眸与剖析(序)	杨剑龙 1
-------------------	-------

第一辑

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	2
——新时期小说中的当代“新乡绅”形象	
“城”与“人”的镜像	10
——90年代以来的都市叙事及其电影改编	
新散文的“新”与命名的尴尬	22
断裂与重构:新生代散文的话语转换	30
中国经验与乡村现场	37
——解读长篇小说《双龙村纪事》	
脆弱的崇高	46
——简论《沧浪之水》	
淘洗生活的诗性	58
——李晓君散文印象	
触摸生命	67
——读江子的散文	
生活在何处?	75
——评范晓波的散文	

行旅之思	83
——读夏磊散文集《秋以为期》	
江西新生代散文创作述评	89
晚清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悲剧	96
——评《晚清悲风——文廷式传》	
自是情深能醉人	102
——《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读后	
《亭长小武》：历史虚构下的汉宫晚照	107
平凡人的世界	110
——写给路遥	
瓦尔登湖的宁静（外一篇）	113

第二辑

文学·政治·想象	118
——晚清政治小说与普罗小说的同质化特征	
革命空间的审美之维	133
——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普罗文学	
普罗文学的预设正义和暴力叙事	144
从《中国小说史略》看鲁迅的小说观	153
新月派与中国传统文论	160
启蒙语境下的多重向度	168
——张资平小说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基督教观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179
经典再生产及其文化症候	195
——以“三笑”故事的电影改编为中心	

“戏人”:大众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	209
——20 年代电影人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	
上海市民文化视阈下的早期家庭伦理电影	223
移民社会与影像上海	235
——都市语境下的 20—30 年代上海电影	
都市语境中的早期中国电影及其通俗化传统	247

第一辑

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

——新时期小说中的当代“新乡绅”形象

在对新时期农村社会现状的探索和思考中,当代“新乡绅”的概念逐渐浮现于研究者的视阈。政治学范畴中的“新乡绅”指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掌握农村一部分经济、政治资源,参与社会管理的富裕农民,“由于他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与传统的乡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逐渐被称为‘新乡绅’”^①。这一概念更多是从经济意义上呈现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然而,传统乡绅社会身份的构成并不仅仅在于经济能力,也来自于他们在宗族、道德、文化、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这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所以,本文所指的“新乡绅”是对前者的扩展,即将视野延伸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点,聚焦于农村社会结构调整中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文学的角度审视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政治文化环境,用“新乡绅”这一概念强调封建宗法文化在当代农村社会的残留和复苏。

当代“新乡绅”是改革开放前后在传统文化和乡村管理体制等多重因素制约下产生的民间权威,在权力形态和社会角色上与传统乡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以宗法意识和封建家长制的管理模式支

^① 杨国勇、朱海伦:《“新乡绅”主政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配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公共话语和资源控制,折射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和缺失。由此,新时期作家敏锐地把握到被改革的巨大成就所掩盖的农村深层次矛盾,凸现了在乡土文化历史积淀与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下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农村变革的影响。

乡村权威的文学谱系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乡绅代表乡村社会的宗族权威和道德权威,能够极大地影响民间舆论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在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话中发挥着媒介作用,因此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维持统治秩序的基本单元。然而,乡绅及其所依托的宗法制度在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旧交锋中被推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于是,作家以文化批判、政治批判的不同视角审视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阶层,刻画出鲁四老爷(《祝福》)、赵守义(《霜叶红似二月花》)、罗二爷(《清明时节》)、冯兰池(《红旗谱》)等人物,通过揭露乡绅的伪善、腐朽和宗法权力对农民的戕害凸显宗法制度对现代化进程的阻滞力,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以乡绅为主导的乡村社会结构,展现乡土社会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的必要性。

土地改革之后,集体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村权力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各级‘劳模’和‘精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农民”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十七年”小说中的王金生(《三里湾》)、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等“社会主义农村新人”,都

^① 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是坚定的革命者与理想化的民间英雄的统一。他们作为新时代的先进典型和民间社会的能人,建立起规范乡村社会的新权威。

梁生宝的成长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合作化运动中乡村新权威的形成史。梁生宝是群众和基层组织共同认可的农村领袖,更是革命意识形态改造下的道德模范。他的身上既具有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朴实、勤劳、正直等品格,又显现出意识形态规范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自律,成为区别于一般农民的理想化了的阶级精英。“十七年”文学对梁生宝式人物的书写,体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在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内,反映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主角。

然而,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新时期小说开始重新审视乡村权力的异化,于是塑造出一批呈现了民族文化负性积淀的乡村干部形象。《古船》对赵炳及其家族发迹史的叙述,《羊的门》所建造的“呼家堡王国”,《苍生》、《农民帝国》中邱志国和郭存先从英雄模范到“土皇帝”的身份蜕变,都显示了以封建宗法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变异。之所以称他们为“新乡绅”,是因为以上人物不仅依托于根植在国民性中的宗法观念,形成了类似于传统乡绅的封建家长地位,而且在基层权力体制中部分地再现了传统乡绅的社会角色。他们是处于基层政权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通过政治权力和民间权威的结合构筑并维护着乡土社会的原有秩序。这一类人物作为政权组织体系的基础单元,借助国家意志宰制乡村社会的运行,又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权力集中的家族式、宗法式统治,客观上将现代国家的基层统治转化为乡土性和封建性束缚下的乡村社会自我规范,因而成为具有当代典型意义的“新乡绅”。

赵炳的形象揭示了宗法文化在当代乡村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延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宗族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媾和衍生出这样一个

具有深厚民间根性的政治、文化怪胎：一方面，党员干部的身份和资历是赵炳得以长久把持基层权力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四爷爷”的称呼既体现出他的封建家长地位，又体现出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的回归。赵炳正是在积蓄和驾驭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建立起个人权威，成为连接国家权力和民间社会的枢纽，依靠治权（基层行政权）和族权的统合对洼狸镇实施专制统治。而在他的权势支撑下，赵氏家族也实现了对隋家、李家乃至整个洼狸镇的征服和压制。

与赵炳相比，呼天成的形象显得更加复杂。作为呼家堡的当权者，呼天成成为村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足，也打造了这样一片充溢着集体意识和道德理想的“净地”。然而，小说用“主”和“羊”的《圣经》典故暗喻了呼天成以“救世主”的神圣威权在思想和制度上牢固地控制着呼家堡的村民。他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民间社会的道德训诫和极权统治的制度规训（“十法则”）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封建家长制为内核的道德化、单向性的绝对权威，并试图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延续这一权威。于是，呼家堡的村民成为权力驯化下的顺民，他们失去了自主意识，形成了对呼天成的精神依附，以至于在后者弥留之际，“人们忧心忡忡地想，如果呼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活呢”。从表象上看，呼天成对呼家堡的改造恢复了传统社会的礼治结构，而他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统乡绅社会角色的替代者，用民间戒律和道德教化（“礼”）维持着呼家堡当代形态下的社会秩序（集体体制）。

赵炳和呼天成的典型意义在于：其一，他们拥有基层干部与民间权威的双重身份，这体现出农村权力结构的多元性，由此形成的权力体制影响和制约着现代文明的扩张；其二，赵炳和呼天成是宗法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人格化，在封建宗法观念和权力意志的左右下垄断了乡村公共权力，从家族统治、礼治结构、观念形态和权力运行等方面

呈现出传统乡绅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管理模式。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不仅现实地批判了农村的权力失范,更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诘问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乡村文化生态。

从现代文学对乡绅的批判到新时期小说中“新乡绅”的出现,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文学视阈里的乡村社会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农村新人”也逐渐被“新乡绅”的形象置换,权力的异化和个人的蜕变映射出的是农村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

“新乡绅”形象的文化解码

通过描述“新乡绅”这一制度变迁的畸形产物,新时期的一系列乡土小说揭示出当代农村社会变革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一是封建意识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历史因袭,二是宗族势力在新时期的复兴及其对基层权力的僭越。由此,“新乡绅”形象直观地呈现了乡土文化的情性和当代农村政治文化的缺失。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对农村的全面改造试图清除乡土中国的封建积弊,集体经济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以家族为主体的农村社会结构,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纳入到一体化的框架内。除旧布新的政治举措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一个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国家,把宗族看成封建传统长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尾巴,从而选择了消灭宗族传统文化(如‘破四旧’)的文化政策,然而国家的社会政策却强化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土壤(如户口控制、外出流动限制等)”^①。一方面,社会主义

① 叶本乾:《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1期。

改造吹响了走向现代化的号角,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反封建”成为农村革命、建设的基本诉求;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体制加剧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因而强化了农村社会环境的排他性,使之客观上变成封建宗法文化蛰伏与复苏的温床。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宗法制度占据着社会的主流地位,形成了维系封建宗法秩序的集体无意识。新政权对封建文化的清算只是在表面上祛除了民族文化的负性符号,等级观念、权力崇拜和“唯上”、“唯官”的奴性并没有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得到遏制,相反这种倾向在历史进程中显现出坚硬的生态。《农民帝国》描写了郭存先这个带领农民致富的经济能人在权力和财富面前的自我膨胀——他怀有创造“帝国”的野心,并成为民间社会强势而专横的“土皇上”,甚至发出了“去掉‘土’字就是皇上”的宣言——权力意志的极度扩张暴露出乡村社会中封建观念的历史遗存。同样,《羊的门》也彰显了乡土文化的劣性:呼家堡的男女老少默认甚至心悦诚服地接受呼天成的个人意志对乡村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几十年来,呼家堡人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只有一个声音的日子,如果这声音突然消失的话,呼家堡人倒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于是村民的盲从和崇拜使呼天成的形象日益神圣化,并将其推向“救世主”的王座。

呼天成的政治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缺失。当各级官员们和呼家堡人都以虔诚的姿态敬奉着“呼伯”时,当“集体”悄然间与“呼支书”画上了等号时,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权力的缺席和个人权威的扩张。尽管呼天成认为“他仅仅是上头与下头之间的一个环节”,但事实是乡村政权牢固地依附于他的个人意志,这所谓的“中间环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渗透,而且成为基层权力运作中的实际主导者。

这一现象表明,基层体制在面对乡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牵制时

往往显露出自身的羸弱。“在某些宗族力量强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权威需要借助家族权威的力量建立起来,并借以贯彻执行国家的政令法规。在这些地方,上述两种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集这两种权威于一身的人物是乡村社会事实上的统治者。”^①虽然国家政权试图消化民间的异质性,确立政府在农村生活中的绝对权威,但是它的控制力并不足以完全覆盖广袤的乡土,乡土文化的排他性和政权组织的效能使得乡村治理很难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的基层统治需要得到民间权威的支持以保证政令的通畅,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我调整也催生出一批新的精英——他们具有解决农村公共事务的合法身份和实际操作能力——来维护乡村秩序的稳定。

由此生成的“新乡绅”形象体现出作家对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的清醒认识和文化反思。追溯“新乡绅”的发迹史,我们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不但没有实现平均主义的理想设计,反而加剧了权力和社会资源向少数人的集中,在乡土社会权力崇拜的文化惯性推动下,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分化的迹象。

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诉求并不能障蔽由权力关系失衡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在平等的表象下新的等级秩序被重新建立起来。“四爷爷”、“呼伯”们通过手中的实际权力掌握着乡民的命运,而后者在僵化的秩序下只能被动地接受着权力的指挥和管制,任何试图挑战权威的行为都将受到体制的惩罚。处在社会底端的则是被剥夺走尊严与权利的“斗争对象”,正如隋抱朴兄妹所遭遇的那样,“原罪”和“卑劣”的出身使他们成为革命暴力与权力示范的牺牲品,无力逃避强权对弱者灵魂和身体的肆意践踏。于是,受辱的隋含章和

① 倪伟:《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